

·文献学苑·

试论佛教传播对魏晋南北朝图书出版的影响

李文才 贺春燕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2)

摘要: 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即佛经的翻译丰富了出版的内容、译经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本国僧侣的撰著、伪经的大量造作增加了佛教作品的内容、西方绘画艺术在中国进一步传播。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佛教 传播 图书出版

中图分类号: G239.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6)06-0108-05

A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Buddhism to the Publication During the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Northern Dynasties

Li Wencai He Chunyan (College of Social,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Abstract: It was the propagation of the Buddhism tha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in a high-speed. This function is shown on four aspects: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m classics enriched the publishing content and induced more writing by Chinese monks; large numbers of fabricated classics increased the content of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Painting Art further spread in China.

Key words: the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northern Dynasties; Buddhism; spread; publishing

CLC number: G239.293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6)06-0108-05

论及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影响,当以佛教为最。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佛教对中国民众的生活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随着它的广泛传播而愈来愈深刻。就图书出版而论,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快速发展,虽不能说完全是因为佛教传播的缘故,但佛教的广泛流传,对丰富图书出版的内容和扩大图书需求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无可置疑。佛教传播对魏晋南北朝图书出版事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佛经翻译

佛教传播对魏晋南北朝图书出版事业的影响,首先表现为佛经的翻译丰富了图书出版的内容及增加了图书的总量。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高峰时期,佛教徒为了传播佛教,需将佛教经典由梵文翻译为汉文,因为梵文佛经国人很少能看懂。最早的译经者都是异邦僧侣,见诸史籍的

第一批来华僧人,是东汉明帝十年(公元67年)应邀前来洛阳的人摄摩腾和竺法兰,这两位天竺僧人在洛阳白马寺编译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的最早佛经译本。到东汉末年,来华僧人共译出佛经292部395卷。

魏晋以后,来华僧人日益增多,佛经的翻译工作也进一步展开。如三国时期康居人康僧会,在孙吴都城建康,先后翻译出《阿难念弥》、《镜面王》等经书,又译《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并为之作序。^[1]孙吴黄武三年(224)天竺僧人维祇难,与同伴竺律炎一起来到武昌,随身携带梵本《昙钵经》,后应孙吴士人之请译成汉文,该经书至西晋惠帝时,又被僧法立重新译为五卷。^[2]魏晋南北朝早期的译经代表性人物,当推魏晋之际的竺法护。法护本为大月氏人,曾游历西域诸国,西晋时“遂大齋梵经,还归中夏”,从此专门从事将佛经“写为晋文”的工作。法护“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共译出佛经169部,为佛经翻译做出了重要贡献。^[3]后秦时的

名僧鸠摩罗什(344-413),于公元401年到达长安。后秦主姚兴专门辟出道遥园作为译经的场所,鸠摩罗什担任译主,僧肇等百余名僧人协助,专门从事佛经的译写工作。到413年鸠摩罗什圆寂,共译出佛经98部425卷,数量之多仅次于后来的玄奘,但所译的经、论范围却比玄奘广泛。特别难得的是,鸠摩罗什精通梵、汉两种语言,故而译经的水平远胜前代,其译文典雅而不失原意,既不同于生硬的直译,同时也保存了天然西域之语趣。^[4] 鸠摩罗什所翻译的佛教经论,不仅对传播佛教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也奠定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基础。

随着译经事业的开展,许多中国僧侣也纷纷加入译经的行列。魏晋南北朝是佛经翻译的重要时期,其间外国来华及中国本土僧侣从事佛经翻译者很多,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得到所在政府的支持,因而翻译出来的佛教典籍更加系统,涵盖了大、小乘佛教的经、律、论各部经典。仅据唐释智昇《开元释教录》所载,从三国以来至北周、北齐为止,包括“十六国”政权时期在内,各朝译经者合起来有118人,所译佛经共有1621部4180卷。^[5] 特别要指出的是,此时佛经翻译,并不仅限于由胡、梵文译为汉文,亦有汉著译为外国文字者。如北魏僧人昙谟所著《大乘义章》,胡僧菩提流支读后,大加赞叹,遂把它译为胡书,传之西域;西域沙门常东向遥礼之,号昙谟最为东方圣人。^[6] 再如,北齐人刘世清通晓四夷诸语,后主高纬命其将《涅槃经》译为突厥语以赐突厥可汗,并命令中书侍郎李德林为之作序。^[7]

无论梵文译汉,还是汉语胡译,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既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及胡汉人民的友好交往,也大大丰富和增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出版的内容与数量。由于其时译经数量众多,加上复本、伪经的不断出现,使得编制佛经目录势在必行。东晋释道安于374年编成了我国佛教史上第一部汉译佛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对东汉以来的汉译佛经加以综录;南北朝时期,佛经目录的编制仍在继续,据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大概在刘宋时修成的一部《众经目录》(作者不详),共2卷,著录汉译佛经1089部、2596卷,及至齐梁之际,释僧祐编成《出三藏记集》15卷(简称“祐录”),此为我国第一部保存完整的佛经目录,共著录2162部4328卷,并记述了历代僧人翻译家32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佛经的大量翻译,不仅使社会图书的总量大大增加,而且使图书的结构发生变化。”^[8] 的确,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多次整理编制图书目录,包括佛经目录在内的宗教专业目录的始创,表明了图书总量的增加和图书结构所发生的变化,汉译佛经及围绕佛教而撰作的各种作品,在当时所有出版物中增长速度最快、数量最为巨大。

二 僧侣撰述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及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僧侣和信徒,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对译经的研读,他们在理解、领悟佛经基本教义的基础上,开始撰著以阐发对佛教的见解,促成了大量中国本土僧侣撰著的问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著述的盛况,由梁朝释僧祐的记述可窥一斑:“自尊经神运,秀出俗典。由汉屈梁,世历明哲。虽复缙服素饰,并异迹同归。讲议赞析,代代弥精。注述陶练,人人竞密。所以记论之富,盈阁以物房,书序之繁,充车而被辇矣。”^[9] 中国僧侣、信徒撰著对丰富这一时期图书出版内容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理论著作。随着译经事业的持续进行,中国本土僧侣在参与、协助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也开始独立撰著,为后来佛教的中国化及佛教宗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如三论宗奠基人僧肇,为鸠摩罗什的弟子,在协助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开始独立撰著,其一生著述甚多,代表作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后世称之为“三论”。从哲学角度来看,僧肇三论虽仍使用一些玄学家习用的词汇,但实际上已是佛教哲学著作。再如竺道生,彭城人,幼年从竺法汰出家,为鸠摩罗什座下四大弟子之首,一生著述甚多,如《维摩经义疏》《泥洹经义疏》《法身无色论》《维摩诘经法》等,但大都散佚,流传下来的只有《妙法莲华经疏》两卷。类似僧肇、道生这样的僧人很多。据刘宋陆澄所撰《法论》所辑录,仅刘宋以前中国人所撰写的有关理论著作,不算序言在内,共有16帙,103卷。^[10] 中国僧侣或信徒能够独立撰著,一方面表明中国本土僧人对佛教经义理论的探讨及佛学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同时,他们所撰写的大量著作,对于丰富当时图书编撰出版的内容,也有积极意义。

(2) 佛经注疏。中国僧侣信徒除独立撰著外,还对已经翻译成华文的佛经进行注疏。这主要是因为佛经译本,或卷帙过多,或意义深奥隐晦,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普通僧侣和一般信仰者很难明白其中深意,不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故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名僧大德,模仿儒学经师注疏儒学经典,对这些译经加以注疏。对佛经加以注疏,始自晋僧释道安,经过他注疏的《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便于中国人阅读和理解:“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11] 释道安以后,对佛经的注疏日渐其多,不仅成为“中土佛教典籍之要项”,^[12] 而且也成为其时图书编撰出版的一项新内容。

(3) 地理书籍。魏晋南北朝时期地理游记类的著作大盛,也是当时图书出版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为什么地理游记类著作会出现一时繁荣的景象呢?其原因与佛教传播

也有关系,向达先生在其《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一文中,曾对此有所阐释:“汉唐之间世乱最甚,而地志之作,亦复称盛。其时佛教初入中国,宗派未圆,典籍多阙,怀疑莫决。于是高僧大德发愤忘食,履险若夷。轻万死以涉葱岭,重一言而之柰苑。魏晋以降,不乏其人,纪行之作,时有闻所闻……”向氏从取经僧的角度,对此现象做出解释,可谓精准,他在该文中考论的今已亡佚的《地志》著作有:《吴时外国传》《扶南记》(康泰)《扶南异物志》(一卷,朱应)《南州异物志》(一卷,万震)《外国事》(支僧载)《游行外国传》(一卷,释智猛)《外国传》(五卷,释昙景)《历国传》(二卷,释法盛)《佛国记》(竺法维)《扶南记》(竺枝),其中后6种均为西行取经的求法僧所撰写。^[13]

(4) 佛经抄写。由于佛教的广泛流传和统治阶级的提倡,佛教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信仰佛教的人日益增多。为了表示对佛的皈依和虔诚,人们除了建塔造像之外,或抄写佛经,或为禅师树立碑文。一些贵族和有钱人家,有时不亲自抄写,而是雇人抄经,这样逐渐出现靠抄经为生的人。由于这个缘故,佛教经典或与佛教相关的文章典籍,一时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编撰出版中的荦荦大者。

如刘慧斐“少博学,能属文,……尤明释典,工篆隶,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常所诵者百余卷。”^[14]这是佛教信徒自己动手抄写佛经;又如,徐孝克曾将皇帝赏赐给他的石头津税收,“悉用设斋写经,随得随尽。”^[15]这是雇人抄写佛经;他如,刘宋彭城王刘义康,曾集合众僧,将汉译《胜鬘经》广写云布,以泽未洽,^[16]则是赞助他人抄经。再如,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开府聚士,抄写五经及佛教经典。^[17]基于对佛教的信仰,萧子良不仅资助别人抄写,还亲自曾手撰《华严经》《贫女为国王夫人经》等36部122卷,《抄成实论》9卷则是他让释僧柔、释慧次抄写的。^[18]又如,刘芳在年青时,“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十数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19]这是寺院雇人抄写佛经,从刘芳每年能抄一百多卷并一直抄了十几年的情况,可见当时寺院抄写佛经之多。又如,陈叔陵在母亲死后,“伪为哀毁,自称刺血写《涅槃》经。”^[20]表明当时已有抄写佛经替死者超度亡魂的社会习俗,而这个社会习俗又进一步说明抄写佛经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又如姚察,幼年即从钟山明庆寺尚禅师受菩提戒,及入仕陈朝,所得俸禄都用于建塔造寺,并亲为禅师撰写碑文,由于他谙熟佛典,故所撰众塔及众僧文章,无不缜密遒丽。^[21]除以僧侣、塔寺为题材撰写文章外,南朝有许多诗词歌赋,在内容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的影响,有些甚至直接以佛教内容作为写作题材,也表明佛教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而这也

成为当时图书出版的一个新内容。

三 伪经造作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佛经的社会需求量大增,于是就有人伪造佛经。大量佛教伪经的出现,对于弘扬佛教的僧徒而言,极其可恶,但对图书出版业来说,却从一个方面丰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出版的内容。

六朝时期盛行伪造之风,伪风所及,佛教经典亦不能幸免。早在东晋释道安时已经有伪经出现,道安在《疑经录序》对造作伪经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并说明自己要将这些伪经指出的原因:“外国僧法,学皆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受后学。若有一字异者,共相推校,得便摈之,僧法无纵也。经至晋土,其年未远。而喜事者以沙糶金,斌斌如也。如无括正,何以别真伪乎?农者禾草俱存,后稷为之叹息。金匱玉石同缙,卞和为之怀耻。安敢豫学次,见泾渭淆杂,龙蛇并进,岂不耻之?”^[22]并在他编撰的佛典目录《综理众经目录》中,指出当时有伪经25部28卷。到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时,伪经又增加至45部257卷。及至隋初法任等编撰佛典目录时,共有疑惑之经55部68卷,伪惑之经则有143部314卷。魏晋南北朝时期伪造佛经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伪造佛经最早见于史籍者,为僧人慧达,释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曾说:“昔安法师(释道安)摘出伪经二十六部,又指慧达道人以为深戒。”^[23]道安所以要举慧达为反面事例,原因就在于他伪造佛经。魏晋南北朝时期,伪造佛经者代不乏人,如帛尸梨密的弟子觅历,因伪造《大比丘尼戒》,而受到法汰、道林的指斥。^[24]宋文帝元嘉时期竺法度所造《异威仪》、南齐时僧法度所造《毗跋律》、东魏时期孙敬德所造之《高王观世音经》等,均是作者姓名可考的佛教伪经。^[25]

佛教伪经丛出不穷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者无非如下:其一,因为自信神异或为祈福免祸而造伪经。如汉献帝建安末年,济阴人丁氏之妻,突然患病,便能“胡语”,又向旁人索要纸笔,自为“胡书”,所写内容,后来经过一个西域胡人的鉴别,据说是梵文佛经。^[26]当时中国人能识“胡文”者甚少,丁氏妻信笔涂鸦经“西域胡人”指认后而成为“佛经”,自然只能是伪经。类似的例子,还有南齐末年,太学博士江泌有女尼子,据说从九岁到十六岁期间,常常闭目静坐,先后写出了21种佛经,有时说是上天所传,有时说是神仙所授,她的舅舅孙质认为是“真经”,于是好事者四出传写,后来佞佛的梁武帝还曾召见了她,她也因此而出家,取名僧法。^[27]再如,被释智昇《开元释教录》列入“伪妄”类的《高王观世音经》,其造作时间为东魏天平年间(534-537),时人孙敬德犯下死罪,临刑前他曾梦见一沙门教他念诵《救生观世音经》

一千遍,说如果这样的话,则刀斫之而不伤。后丞相高欢得知此事,遂上表免其一死,因而此经便定名为《高王观世音经》。隋朝时又有人造《观音无畏论》(一卷)来解释《高王观世音经》。^[28]这两本经书,显然均是伪造,目的则在于免祸,当然也有可能是佛教徒为了宣传佛教而编造出来的。其二,伪造佛经以图钱财。任何一种事物,只要社会有需求,就会有人以之谋利,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佛经的社会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于是就有人造作伪书以牟利。如萧梁时郢州(今湖北武昌)僧人妙光,因不守戒律被郢州僧正赶走。妙光来到京师建康后,先是造《萨婆若陀眷属庄严经》一卷,后又“抄略诸经,以私意妄造成之。有路谈者,为之润辞。”为牟取暴利,妙光使人四处传抄这些伪经,以诱惑供养施舍。后来事情败露,梁武帝敕令僧正慧超等二十余人,审讯妙光,并将搜出的二十多本伪经烧毁。^[29]其三,因为与道教争先后而造伪经。自王浮作《化胡经》之后,佛教徒对于老子为佛弟子之说坚信不疑,遂有人继续伪造佛经以坚定这个说法。其中《清净法行经》最为著名,该经被《法经录》列入大乘疑惑经中。除此而外,《首罗比丘经》(即《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钵记经》、《周书异记》、《法本内传》、《佛说决罪福经》、《小法灭尽经》(或《法灭尽经》)、《法要舍身经》等,也都被学者认定为疑伪经书。^[30]

四 佛教图画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流行,西方绘画艺术也大量传入中国,这也丰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出版的内容。佛教壁画的出现也很早,东汉明帝时所建佛寺中当已经施用壁画,据《后汉书·西域传》:“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金黄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此事见《高僧传》所载:“(蔡)愔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既至雒阳,明帝即令画工图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31]不过,这个时候的佛教画像还比较简单,也比较少见。

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图画已经在中国大行其道,中亚地区与今印度半岛的绘画技法也开始为中国画家借鉴、吸收。据史载:“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戴)颙亦参焉。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肥耳耳。’既错减臂胖,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32]戴颙能通过人体各个部位肥瘦对比,找出铜像所存在的问题,实与他掌握了天竺“晕染法”的绘画技巧有关系。天竺绘画技巧中的晕染法,为越来越多的中国画家所掌握,如萧梁时著名画家张僧繇,善画寺院壁画,其笔法即颇受印度技法的影响,史言张

氏“殊方夷夏,实参其妙”。此前的中国画多是线条型,凹凸不易显示,在吸取了天竺的晕染法后,就增添了画面的立体感,据载,梁武帝大同三年(537)新建一寺:“寺门遍画凹凸花,代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人咸异之,乃名凹凸寺。”^[33]晕染法在中国绘画史上影响颇大,以后更成为中国画的基本技法之一。当时掌握这种绘画方法的人很多,如梁元帝萧绎“天生善书画”,他可以在宴席上随手几笔,就完成数个人物肖像画,就是随便问一个孩童,他也能说出画的是谁。再如,彭城人刘岳:“才学快士,而画绝伦。后随武陵王(萧纪)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34]

外国绘画技法纯粹是由于佛教的原因而被中国人所接受,这种说法可能过于绝对,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当时采取印度画技的壁画或图画中,绝大多数是为佛经或寺院所作,如上述诸人绘画之主体部分,均以佛教内容为题材,史载梁元帝“天生善书画……尝画圣僧,武帝亲为赞之。”^[35]又如,顾长康所画《维摩诘像》即《维摩诘画像》,与师子国所贡献玉佛像、徵士戴安道手制之五躯佛像,在宋、齐、梁三代一直并称为瓦官寺“三绝”。^[36]而梁武帝大同年间,瓦官寺扩建,“其图诸经变,并吴人(张)僧繇运手。”^[37]可见,外国绘画技法,绝大多数情况下,特别在传入初期确是主要运用于佛教绘画方面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正是佛教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外国绘画技法在中国的流行,西方绘画技法流入中国,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绘画技法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中国图书编撰出版的内容和形式。

五 语结

综上所述,佛教的广泛传播大大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无论是佛经的翻译注疏,还是僧侣信徒的撰作著述,以及西方绘画技法为中国作者所使用,都从不同方面丰富了其时图书出版的内容和形式,也增加了图书出版的数量;甚至于伪造佛经的盛行,也从某一方面满足了图书的社会需求,同时对于藏书抄书风气的形成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广泛传播及其中国化的进程;而佛经翻译从个人自发的行为,转为有规模有组织的政府行为,则不仅促进了翻译质量的不断提高和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的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图书出版的速度、增加了图书出版的数量,由此促进了图书市场的繁荣。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与佛教的广泛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参考文献:

[1][2][3][31] 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8, 22, 23, 3.
- [4][11][25][30]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52- 54, 179, 421, 422- 424.
- [5][12] 杨衒之. 范祥雍校注. 洛阳伽蓝记校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8: 290- 291, 391.
- [6] 释慧皎. 高僧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231.
- [7] 李百药. 北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267.
- [8] 李瑞良. 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61.
- [9][10][16] 释僧祐. 出三藏记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428, 428- 447, 348- 349.
- [13][37]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563- 576.
- [14] 李延寿. 南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902.
- [15][20][21] 姚思廉. 陈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338, 495, 352.
- [17] 萧子显. 南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698.
- [18][22][23][29] 释僧祐. 出三藏记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218- 220, 221- 22, 224, 231.
- [19] 魏收. 魏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219.
- [24][26][27] 释僧祐. 出三藏记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417.
- [28] 释智昇. 开元释教录 [A]. 大正藏 [Z].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56.
- [32][36] 沈约. 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277- 2278, 793.
- [33] 许嵩. 建康实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686.
- [34] 颜之推. 王利器集解. 颜氏家训集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578- 579.
- [35][36] 姚思廉. 梁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800.
- 作者简介: 李文才 (1969-), 男, 历史学博士,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贺春燕 (1972-), 女, 历史学学士,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上接第 94 页)

- [2005- 05- 16]. <http://www.sipo.gov.cn>.
- [5] 多媒体档案描述方案 [DB/OL]. [2006- 05- 16]. <http://www.sipo.gov.cn>.
- [6] 氨基酸生产的代谢工程 [DB/OL]. [2006- 05- 17]. <http://www.sipo.gov.cn>.
- [7] 通过基因扩增增加赖氨酸产量 [DB/OL]. [2006- 05- 22]. <http://www.sipo.gov.cn>.
- [8] 制备颗粒状 L- 赖氨酸的方法 [DB/OL]. [2006- 05- 30]. <http://www.sipo.gov.cn>.
- [9] 一种制备颗粒状 L- 赖氨酸饲料添加剂的方法 [DB/OL]. [2006- 05- 30]. <http://www.sipo.gov.cn>.
- [10] 永久磁铁励磁的同步电机 [DB/OL]. [2005- 06- 05]. <http://www.sipo.gov.cn>.
- [11] 吹风机 [DB/OL]. [2006- 05- 15]. <http://www.sipo.gov.cn>.
- [12] 用于调节内燃机燃油供给压力的改进的电磁阀 [DB/OL]. [2006- 06- 22]. <http://www.sipo.gov.cn>.
- [13] 污染控制装置 [DB/OL]. [2006- 06- 22]. <http://www.sipo.gov.cn>.
- [14] 通信系统的发射功率控制方法 [DB/OL]. [2006- 06- 23]. <http://www.sipo.gov.cn>.
- [15] 供应商与客户装置之间的通信方法和系统 [DB/OL]. [2006- 06- 25]. <http://www.sipo.gov.cn>.
- [16] 在模块化计算机系统中利用系统配置的系统和方法 [DB/OL]. [2006- 05- 27]. <http://www.sipo.gov.cn>.
- [17] 计算机系统的兼容订单的生成 [DB/OL]. [2006- 06- 27]. <http://www.sipo.gov.cn>.
- [18] 剃刀 [DB/OL]. [2006- 06- 30]. <http://www.sipo.gov.cn>.
- [19] 血压测量系统 [DB/OL]. [2006- 06- 30]. <http://www.sipo.gov.cn>.
- [20] 为远程通信交换机建立软件的方法 [DB/OL]. [2006- 05- 10]. <http://www.sipo.gov.cn>.
- [21] 用于授权检验的方法 [DB/OL]. <http://www.sipo.gov.cn>.
- [22] 一种管理互配单元及生产该单元的方法 [DB/OL]. [2006- 05- 07]. <http://www.sipo.gov.cn>.
- [23] 空气净化装置 [DB/OL]. [2006- 06- 30]. <http://www.sipo.gov.cn>.
- [24] 彩色显像管 [DB/OL]. [2006- 05- 22]. <http://www.sipo.gov.cn>.
- [25] 存储器输出缓冲器预充电控制电路 [DB/OL]. [2006- 05- 05]. <http://www.sipo.gov.cn>.
- [26] 导航系统 [DB/OL]. [2006- 05- 06]. <http://www.sipo.gov.cn>.
- [27] 李月松. 现代日语中的汉字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 [28] 文力. 日本厂商名称翻译浅谈 [J]. 电池, 1988, (1): 46- 50.
- 作者简介: 陈利涛 (1965-), 女,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副研究馆员; 赵真 (1970-), 男,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馆员.